

历史视野中的 人口与现代化

王渊明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历史视野中的 人口与现代化

王渊明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新登字 1 号

责任编辑:朱银才

封面设计:孙 璐

责任校对:朱晓阳

历史视野中的人口与现代化

王 渊 明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浙江大学印刷厂印刷

(杭州玉古路 20 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375 插页 2 字数 28 万 印数 1—2 000

1995 年 2 月第 1 版 199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13-01164-2/K·307 定 价: 10.50 元

前 言

法国一位史学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史学是它的时代的产儿。”此话不假，史学的生命力正在于它植根于现实社会之中。现实是历史的延伸，要真正理解现实、把握现实、开拓未来，就不能割断与历史的联系。

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我在作选题研究时，便将目光对准了现实，力求抓住现实社会中一些令人困惑的重大问题，从历史的角度加以认识和理解。人口问题在当今中国乃至世界都是倍受人们关注、也常常引起人们困惑的一个问题。人口发展状况会深深影响社会发展，影响历史进程，这在当今已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史学界对世界各国人口发展的历史和世界历史上人口与经济和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甚少。但人们却迫切需要了解这方面的问题，例如：当代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入口问题是何以产生的？欧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是否有过同样的经历？其人口问题又是如何解决的？带着诸如此类的问题，我读了一些有关的书籍，在读书过程中有些心得，便写了下来，经过日积月累，形成了这本小册子。

这本小册子的内容，归纳起来想要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人口状况与现代化发展的关系，二是现代化发展与人口发展的关系。这两个问题的探讨都兼顾了当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种类型国家的历史经历和现实处境，从比较的视野中加以研究，以期能从

中得到启迪，得到借鉴。

什么是现代化？这是一个在学术界仍争议不休的问题，也是我在研究中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好在这不是本书的重点问题，无需在概念的争议上花费太多的笔墨。当然，本书是不能完全回避这一问题的。我的理解，现代化是指从传统的农牧经济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本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现代化这一概念的。我遇到的第二个困难是人口数据方面的。由于所能掌握的资料的局限和本人能力、兴趣等方面的限制，我没有在各国历史上人口数据的考据和统计计算方面花太多的力气。值得庆幸的是国内外的人口史和历史人口学专家已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研究，使我得益不少。

本书在注释形式上与一般书籍有所不同，应在前言中作些说明。本书注释采用目前欧美一些国家学术著作中常用的方式，把引注的书籍、文章均按作者姓名、出版（发表）的时间顺序总列于本书“主要参考书目”之中，在行文中仅注出作者姓名、出版时间和书刊页码，读者据此可在书目索引中查到这一书籍或文章的书名、篇名及出版情况。例如，行文注“Abel, 1980, 41”，“Abel”为作者姓名，“1980”指该书出版年份，“41”指第41页。据“Abel, 1980”可在本书“主要参考书目”中查到该书名为 *Agricultural Fluctuations in Europe*，由 Methuen & Co. Ltd 出版。

本研究课题已被列入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予以资助。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曾经得到王正平教授、庞卓恒教授、楼均信教授等师长的指导，对于师长和朋友们的热忱指导和帮助，我深表谢忱！中国古代的一些典籍和西方历史上的一些名著，版本较多，用上述注释方法对读者恐有不便，因而本书对这类书籍的行文注为注出作者、书名或篇目、卷目（中国古籍仅注书名与篇目和卷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亦在行文中注出书名和卷次，书末参考书目一般不再列出。

本书是我对历史人口学和人口史研究的初步尝试，不成熟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1994年2月于杭州大学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传统社会的人口与经济	1
第一节 前工业时代的人口与经济和社会发展	1
第二节 中国古代的人口与经济	24
第三节 古代希腊罗马的人口与人口控制	63
第四节 西欧封建社会的经济与人口	94
第二章 西欧的人口与现代化	122
第一节 1500—1870 年西欧的人口与经济发展	122
第二节 英国率先经济起飞的人口条件	153
第三节 法国人口与现代化发展	183
第三章 欧洲现代化与人口发展	210
第一节 人口转变理论述评	210
第二节 英国的人口转变	224
第三节 欧洲其他国家的人口转变	248
第四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欧国家的人口发展	272
第四章 当代发展中国家的户口问题	290
第一节 当代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增长及其对经济的影 响	290
第二节 当代发展中国家的户口转变	318
主要参考书目	344

第一章

传统社会的人口与经济

第一节 前工业时代的人口与 经济和社会发展

一、世界历史上的4次人口增长浪潮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迄今已发生过4次重大的人口增长浪潮。第一次浪潮发生于农牧经济产生之后，也就是农业革命之后。新石器革命（大约发生于前1万—前5000年间）后，农业与畜牧业产生并迅速传播、推广，带动了人口的大量增殖。从约公元前5000年起，开始了第一次人口增长浪潮。据估计，公元前1万年，全球总人口约在200—1000万人之间，取近中间值，大约在400万人左右（Cipolla, 1981, 115; McEvedy & Jones, 1978, 343）。在前1万—前5000年间全球总人口增长甚小，基本上保持稳定状态。从前5000年起增长速度逐渐加快，在第5千纪，全球总人口增加了50%，在之后的3000年中平均每千年翻一番。在公元前的最后1000年中，人口翻番的时间间隔又从千年缩短为500年。这次全球性人口增长浪潮持续到约公元2世纪，全球总人口增至约2亿人。此后，人口发展开始呈停滞乃至衰落趋势。

第一次人口增长浪潮是与农业革命的发生和农业文明的传播并发的。在这次浪潮中，近东地区最早的一批文明国家是排头兵，这些国家的人口增长对全球人口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公元3世纪后，全球人口总数出现暂时下跌，公元6世纪跌到谷底，随后又保持了几百年的相对停滞状态。大约从公元10世纪起，开始了第二次人口增长浪潮。这次人口增长浪潮持续到14世纪，达到人口增长的波峰，全球总人口增至近4亿。在增长速度最快的11世纪，全球人口增加了20%。第二次人口增长浪潮源于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较大提高。第二次全球人口增长的主要份额在中国和西欧。中国农业文明的发展是农业文明发展的顶峰。

伴随西欧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开始了人类历史上第三次人口增长浪潮。这次浪潮从15、16世纪开始，持续到19世纪末。人口增长的峰期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1750年时全球总人口约在6.5~8.5亿之间，1805年达11—13亿，到1900年超过16亿（Cipolla, 1981, 117）。对于这次增长浪潮，中国人口的增长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这次人口增长的主体部分在欧洲，尤其在西欧。1750年欧洲人口约占全球总人口的15%，1900年增至25%，尚不包括由欧洲移居世界各地的欧洲移民（Cipolla, 1981, 116—120）。第三次人口增长浪潮主要是伴随欧美工业革命爆发而出现的。

20世纪上半叶，欧美国家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而发生了人口转变，人口增长速度减缓。但这并未对全球人口的增长产生根本性的影响，相反，全球人口的增长出现了第四次浪潮，增长的速度大大超过了前三次。全球人口20世纪初为16亿，1950年增至25亿，1975年又超过了40亿，1988年达到了50亿。这次人口增长浪潮至今尚未达到峰值，增长还将持续大半个世纪，乃至一个世纪，届时人口总数可能将达80亿以上（McEvedy & Jones, 1978, 349）。第四次人口增长浪潮是与工业化在全球范围内的逐渐展开相联系的。人口增长主要发生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欧洲人口在全球总人口中的比重呈下降态势，1979年欧洲

人口只占全球总人口的 11%。

4 次人口增长浪潮，实质上也可说是 2 次浪潮、4 个波段。这就是分别由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所引起的人口增长浪潮，每次浪潮各有两个波段，分别与农业革命、工业革命的发生、发展和传播相联系。

现代化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转变。本书所研讨的问题主要与第三、四次人口增长浪潮的产生、发展和可能的终结有关。但第三、四次人口增长浪潮的发生、工业革命的开端与第一、二次人口增长浪潮及那时的经济和社会状态有着前后相继的因果关系。所以，讨论人口发展与现代化的关系，须从传统农业社会谈起。

二、传统社会中人口的波浪状缓慢增长

4 次浪潮反映的是全球人口增长的总态势，与某一具体国家人口的发展不是一回事。在前工业时代，由于地理环境、历史环境、经济活动、文化传统等各种因素的作用，不同社会和国家的人口发展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多样性。但同处农牧传统社会，当然又有许多共同性。同近现代工业社会人口的持续增长不同，世界各国、各地区传统社会中人口总量大都呈波浪循环状发展，或者长期保持大致的稳定（指波峰相近），或在波浪循环中增长，但从长时段观察，增长十分缓慢。

近东一些国家和地区，传统社会中的人口增长都保持长期相对稳定的状态。在人口发展循环中，波段间峰值（人口增长最高值）和谷值（人口降低最低值）变化不大。

埃及便是如此。从史前时代到公元 1 世纪，埃及人口有了较大幅度增长。公元 1 至 2 世纪，达到人口增长峰值。美国历史学

家罗素估计,当时埃及总人口约450万人^①,此后衰落,按波浪循环状运动。3世纪时埃及总人口降至320万,6世纪末回升到350万,7世纪复降为260万,8、9世纪大致保持稳定,10世纪时更降至170万左右,12世纪回升至240万,至14世纪中期回升到400余万,到15世纪再降至约315—336万,这个数字大致稳定地保持到16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占领埃及(Russell, 1987, 75—98)。麦克卫迪和贞斯的估量与此有些不同,但多是在某些具体细节上的差异。如罗素认为10世纪前后是人口增长的谷底,而麦克卫迪等人则认为是回升的波峰;对谷底人口总数的最低限两者估计也不同。但两种人口估量反映的人口运动的轮廓却大致相似,都认为,1至16世纪埃及人口保持着大致稳定,人口运动各波段的峰值和谷值没有明显变化。

直到18、19世纪,近东一些国家和地区才改变这种循环起伏状态,人口总数有所增长。

在东亚、南亚和西欧一些文明发达国家,前工业社会的人口在循环波动中呈梯级式增长,其梯级间增长的程度,以社会生产发展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古代与中世纪的印度(包括今之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等国),属增长梯距(指两个梯级之间的差距)较小的国家。据印度学者古帕塔等人的研究,公元前300年至公元600年间,印度人口循环的峰值约在1亿人,到1600年前后,峰值人口提高到1.15亿,到1800年,峰值人口再增至1.54亿。人口在起伏循环中增长,从第一梯级到第三梯级,1200多年中人口总数增长仅约54%(Gupta, 1972, 419—435)。

前工业时代,欧洲(尤其是西欧)的人口也在循环中不断增

^① 古代史家约瑟夫估计此时埃及有750万人,但近代以来史家多认为此数据不可信。

长，其增幅远大于印度和近东、中东各国。前工业时代欧洲大陆的人口增长大致上经历了两个梯级。第一个梯级从远古至罗马帝国时期，公元2世纪末、3世纪初，人口增长达到峰值，约为3600万人。此后开始下降，公元6世纪末、7世纪初降到谷底，此后缓慢回升。11世纪后又加快增长，到14世纪初达到第二个梯级的峰值，总人口约近8000万，比第一个梯级增长1倍多。14世纪和15世纪上半叶，欧洲大陆人口又大幅度下跌，15世纪下半叶起再度回升。此后人口发展呈连续、高速增长状。

在世界各国前工业社会的历史上，人口总数增长幅度之大，波浪起伏之多，当首推中国。从上古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增长大致上经历了4个梯级。第一梯级从夏至战国（迟至秦代），人口总数在1000—3200万之间波动；第二梯级从汉至隋唐，人口总数在1300—6000万之间波动；第三个梯级从宋至清乾隆年间，人口峰值达到1.1亿，人口数量在5400—11000万之间波动；从18世纪中叶乾隆年间到本世纪30年代为第四梯级，人口总数跃至3—4.7亿之间。西欧前工业时代人口增长只经历了两个梯级或两个波段，而中国传统社会的人口增长则经历了至少4个梯级、14个波段（见表1—4）。西欧两个梯级间增幅为1倍强，而在中国，第四个梯级比第一个梯级增幅高达近14倍（赵文林、谢淑君，1988，545—549）。

人口发展循环和缓慢的梯级式增长是传统农牧社会中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状况变化之间矛盾和统一运动的结果。在近现代工业社会中，由于社会生产的巨大发展，人口发展能够避免波浪状循环而保持持续稳定增长的态势。但在前工业社会中，在落后的生产和技术状况下，生产资料并不是无限的，如果人口增长超过了生产所能负载的限度，增长的人口便不能与生产资料结合，或在隐形失业的情形下结合，势必出现人口过剩。人们的生活水平下降，在社会财富分配上的矛盾亦趋激化，这些都

会导致人口死亡率上升，使人口总数减少。当人口的减少使人口数量与可供生产资料的比例有利于人口发展时，人口会再度增长。由是，人口的发展便呈现了波浪循环状态。

这种循环常常包含着梯级式增长。伴随历史的发展，人们的生产能力、知识和技术水平也在提高。人们逐渐能从自然界获得更多的物质生活资料，养活更多的人口，社会的总人口也跃上一个新的梯级。在前工业社会中，人们的生产技术、生产能力的发展往往是由渐变到突变、由积累到突破，然后新技术再由点到面推广的，生产的发展呈阶梯式提高。随之，人口总数也呈梯级式增长。

生产能力的提高、生产的发展和扩大，是人口增长的基础。同理，前工业时代一个社会人口总量增长的幅度、速度，也反映了该社会生产发展的程度。中国古代人口增幅之大，正是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和文明发展程度之高的写照。但由于传统农业社会生产技术的改进常处于停滞状态，生产力发展缓慢，人口的增长速度也势必缓慢。就中国而言，第一梯级的峰值在前334—前310年，人口总数为3200万人，1852年增为4.4亿人，平均人口年增长率约为0.12%。宁可先生估算从公元2年到1840年中国人口平均增长率为0.1%（宁可，1980）。西欧从第一个梯级峰值的公元200年到1600年，人口年增长率仅为0.07%，与近代西欧1%以上的年增长率和当代一些发展中国家2—3%甚至更高的年增长率相比，显然缓慢得多。

人口增长的速度主要取决于生产力水平，取决于社会生产在质和量上的发展程度。但不可将这一点夸大化、绝对化。影响人口发展的因素有许多，例如生产关系、自然环境、社会政治环境、历史传统（包括历史地继承下来的人口状况、人口密度、人们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历史上形成的人口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政府政策、家庭形式、关于人口婚姻家庭等方面的价值观念和意

识形态，等等。这些因素都会作用于人口的发展，使世界各国前工业时代的人口发展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

三、人口增长与前工业社会的经济和技术发展

一定数量的人口存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1884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

那么，这两种生产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作用是等量齐观呢，还是有所区别？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用大量的材料，论证了在原始氏族社会中，人类自身的生产即血缘关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只起次要的作用。他指出：“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缘关系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换言之，劳动愈发展，血缘关系的支配也愈为削弱。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同是决定性因素，但在不同时代，由于两种生产本身发展程度的不同，其作用的程度也有所不同。

构成人类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两个方面，是紧密联系、互为条件的。没有人，没有人类自身的生产，自然无所谓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没有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也不会有人类自身的生产。但两种生产又彼此互相制约。一方面，“每一种特殊的、历

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692），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制约着人类自身的生产；另一方面，人类自身的生产又制约着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尤其在前工业社会中，由于劳动发展的程度较低，家庭关系、人口再生产对社会生活、对社会制度的决定性作用愈加明显，对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影响也愈大。

关于人类社会历史上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经济进步之间相互制衡、相互补充促进的关系，学术界提出过两种貌似相反、实则互补的理论，即“发明拉力假说”和“人口推力假说”。

“发明拉力假说”（Invention—pull hypothesis）强调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明和运用对人口增长的制约与推动作用。发明拉力说常被人们贴上“马尔萨斯主义”的标签。实际上马尔萨斯在其《人口原理》一书中并未系统地阐述过这一理论。但这种理论在强调技术发明时，忽视了人口增长的作用，把人口看作是被动消极的因素，具有马尔萨斯理论的某些倾向。发明拉力说的理论代表主要有齐波拉和契尔德等人。齐波拉的《世界人口经济史》是这一理论的代表作之一。

发明拉力说认为，在一定的生产资源条件下，所能维持的人口总量有某种限制。人口有一种自然的生长趋势，它推动总人口不断增长，直至达到极限。但伴随人口增长，人均占有生产和生活资料的份额减少，人均生活水平下降，人口死亡率随之提高。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人们被迫采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节制人口增长，人口数量渐达到一种相对稳定的停滞状态。这时，某些技术发明出现了，这些发明增强了生产能力，能为更多的人提供生活资料，于是人口增长速度加快，人口总数增长，一直到这种新的生产能力所蕴含的生产潜能被耗尽为止。那时，人口增长再度停滞，人口总量再度稳定。之后，随着另外的新发明出现和运用，人

口发展再次出现新的从增长到稳定的周期性运动。人口总量便在这种周期循环运动中不断迈上更高的台阶。

按照这种理论，技术的发明和运用并不依赖于人口增长。它的发生独立于人口因素之外。人口增长的历史只不过是自发明史的一种结果而已。在这种理论中，看不到在历史上人口增长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必要性。

与发明拉力说相对立的是“人口推力假说”(Population—push hypothesis)。这种理论认为，增加生产的一些技术发明，可以不必以人口增长的多寡为必要条件，可以不依赖于人口的增长而独自发生，但这些新的技术发明的运用和推广却有赖于人口的增长。要使这些新的技术发明得以推广运用，人口增长虽不是充分的条件，却是必要的条件。

有两种导致新的技术发明得以运用、生产得以发展的人口推动机制。第一种机制是，由于家庭数量增加，每个家庭占用土地的面积减少，家庭部分劳动力闲置，家庭收入减少，从而迫使他们改变生产方法，以较多的劳动力投入，获得较多的产出量。第二种人口推力机制是，假设土地的面积相同，随着家庭规模的扩大，维持一个家庭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也必须有所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改用新的生产方法和技术，通过追加劳动，得到更多的土地产出量。

人口推力说认为，随着人口增长，人口推力会推动上述两种机制按相同方向发挥作用，推动新的生产技术的发明和推广。

这种理论所指的技术发明，主要特点是通过投入更多的劳动而取得更多的产品，是以劳动力更加密集化为条件的发明。在人口稀少时，这种技术的采用既无必要，也无条件。人口的增长提供了其采用的动力和条件，它的采用又使生产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人口的增长与技术发明运用相互促进，构成一种锁链式反应，推动生产和人口一次又一次的增长。

人口推力说最重要的倡导者当推伊斯特·博塞勒普。她的《农业增长的条件》和《人口与技术变化》等著作是人口推力说的力作。人口推力说在国外人口经济史和人口经济学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市场，很多学者全部或部分地接受了这一理论。国内一些著名的人口史、经济史专家也提出过一些颇具相似性的见解。

人口推力说在解释前工业社会技术进步和生产发展方面，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前工业时代社会经济的主导部分是农牧经济（原始时代为采集渔猎经济），包括农牧生产和手工业生产在内的整个社会生产，都是建立在手工劳动基础上的，都具有劳动密集型经济的特征，在这种经济中，生产技术的进步和推广、生产的发展，往往以劳动的追加作为条件。马克思曾指出：“生产越是以单纯的体力劳动、以使用肌肉等为基础，简言之，越是以单个人的肉体紧张劳动为基础，生产力的增长，就越是依赖于单个人的大规模的共同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392）人口的增长、劳动力的充足供应，往往是前工业时代技术进步和生产发展的必要条件。

与发明拉力说不同，人口推力说强调了人、人口的能动作用，注意了被前者所忽视的技术和生产发展进步的动因。这都是可取之处。然而，它虽肯定了人口增长的积极作用，却忽视了人口增长还具有消极作用的一面，同样失之偏颇。

人口增长是技术发明运用的动因之一。但我们必须明白，由人口推力导诱的技术发明和运用，是指那种通过追加更多的劳动而使产出有所增长的发明，而非以节省劳动、提高人均劳动生产率为特征的发明创新。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生产资源的利用也有个相对的限度。要开发、利用超出这一限度的生产资源，需要更高的生产能力、更先进的科学技术、更好的工具装备和更大的资本投入。人口的迅速增长往往不能促使这种变化，而是与其相悖。在人口迅速增长的条件下，经常发生的变化不外乎两种：一